

# 一九八〇年代的香港天主教：橋樑角色



湯漢



胡振中樞機於一九八五年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向政府及教會領導人士說：「今日中國越來越開放的情況，普世教會至感欣慰，誠切願意展開交談，促進了解，加強連繫，共同建設社會，造福人類。本人和香

港天主教會亦願意竭盡棉薄，貢獻力量，擔當橋樑的角色，促成這一願望的實現。」

在第二次訪問大陸時，胡樞機又對廣東的政府及教會領導人士說：「天主教香港教區，由於天時地利，應擔任橋樑角色；在地

方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負起聯繫使命。」一九八零年代香港教區的最大特徵，就是擔當橋樑角色。我們既快要邁進一九九零年的時代，因此適宜去回顧及反省一下香港教區如何承擔這項挑戰。

香港教區提供給中國大陸協助交流，主要透過明愛及聖神研究中心，前者著重社會服務，後者強調牧民培育。由於某些工作接合，因此，這兩個機構常保持緊密連繫。

香港明愛與中國的接觸，始自一九八零年。當時，明愛應深圳特區總工會之邀，為深圳幾個不同的單位，舉辦了一些培訓課程，其中包括英語、行政管理、酒店業務等。之後，明愛對大陸的服務逐步擴展，合作對象包括政府方面，私人機構及教會方面。所提供的服務主要是在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範圍上。一九八六年，明愛還籌集本地及海外贊助，成立了「中國服務計劃基金會」。明愛協助大陸的目標，主要是以實際方式履行基督宗教所秉持的理想；它不是向國內傳教的工具，而是以服務去見証福音精神，發揮愛心，使更多人受益，也引起更多人自願以愛心服務他人。

聖神研究中心同事楊祖媛女士曾為教區公教報附刊《主愛中華》，走訪一些在國內服務過的明愛職員，請他們分享個人的經驗和心得，現介紹四個例子如下：

一九八七年，一位大學畢業的青年，聞說明愛招募英語教師，赴廣東南部為一批中學教師進修班授課。為了好奇，也因尚未找到其他工作，遂申請了這份工作，結果被取錄。與香港的同類工作比較，這份教學擔子比較輕鬆，學生人數也較少，年齡也較大，而學習卻很認真，他們都十分用功。

一年課程完成後，明愛把他調往另一個

城市，為一間師範學校舉辦一個暑期英語班。與他一起的，還有一位美籍耶穌會修士及另一位明愛同事。他的同事會彈結他，透過歌唱教學生；而他自己則採用遊戲教英語。

在整整一年中，最值得他深深懷念的，是替他們煮飯及管理家務的葉師傅。他憶述說：「他做人樂觀，敬業樂群，從不貪小便宜。他只是默默地為我們服務，像母親般照顧我們。由於與他同處，我們的生活充滿著和諧，不會感到離鄉背井的辛酸滋味。他使我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增強了我對別人的信任，也加深了我對人生及工作價值觀的體悟。」

起初，這位大學生對教學並沒有多大好感，只是希望多得一點在國內工作的經驗。他說：「但數月後，我的態度改變了。學生們對知識的渴求和認真態度，迫使我們盡心盡力去備課，而在備課與上課的過程中，我體會到教學工作的意義和目的。當我返回香港時，我加入了教育工作者的行列。」

另一位曾投身弱智兒童培訓計劃的明愛職員，也談及他的經驗。原來，一九八五年，幾位廣州的熱心青年欲幫助弱智兒童，他們滿懷熱誠，卻欠缺經驗，又沒有經費，於是向明愛申請協助，而明愛同意了。

明愛特為負責弱智兒童的老師提供訓練，設計了一項在職培訓課程，安排在周末或假期中舉行。由淺入深，理論與實踐並進。及後，明愛還派出一位專家進駐廣州，協助學校的成立及發展。該校開始時，只有一小撮學生，現已發展至擁有一百四十名學生，年齡在四至廿歲之間，而教職員現有五十人。這個課程使教職員對弱智兒童的基本觀念和態度有顯著改變。最初他們對弱智兒童是出於同情心，實際瞭解不多。接受培訓後，

開始明白到弱智人士也是人，也應享有基本人權。漸漸他們更發現，弱智人士能學習技術，能更自立生活，不需要完全倚靠別人，且能貢獻社會。最後，老師們還把這所學校改名為「至靈」，是「達至靈活」或「達至人的心靈」的意思。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明愛對老人服務的提供。一九八六年，中國政府邀請明愛安老服務部派出有經驗的職員，為國內一些老人院舍的管理，提供協助。他們應邀前往開辦培訓課程，幫助老幹部如何面對退休生活。一位曾參與這項服務的明愛職員記述：「我們的目的，是協助他們了解提供安老服務的基本信念和價值，從而使他們更深了解個人的價值與尊嚴。我們深知，國內一向以集體利益為大前提；但我們覺得我們可把個人的價值觀貢獻給他們。我們邀請他們選派一組人到香港來參觀我們的安老服務工作，此行留給他們很深刻印象，而最使他們感動的，是我們對每一個老年人的服務態度。他們好奇地問，為何我們選這種工作，且懷著這樣喜悅的態度去做。」

他繼續說：「九十位學員參加了我們的培訓課程，他們認真好學的精神及態度，給予我們很深刻印象。初時我們很擔心；由於兩個社會制度的差異，懷疑他們會否接納我們這一套服務老人的觀念。但經過一段時間後，我們終於發現，幾時他們覺得我們的理論對他們有實用，他們便會很快接受。當他們看到我們是言行一致時，更對我們十分信任。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的報酬。」

明愛亦曾應邀在國內舉辦幼兒教育者培育課程。國內幼兒院目前的情況大概與香港六十年代的情況相似，參加課程者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些是大學畢業生，有些則只

是初中生。開始時，他們不太接受明愛所建議的，以為這些理論只能在較富裕的國家才能實行。但在五位華南師範大學的工作人員到訪香港，參觀了明愛的幼兒園後，他們才知道，在香港比在國內用更少的職員，便可管理一所幼兒園。本來，培訓課程原定為期八個月，終於延長至一年。學員們對課程的反應很積極。當明愛職員在一段日子後，再返回國內時，總發覺有很多改變，反映出他們已採納了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方式。

至於聖神研究中心，則是香港教區提供牧民服務與聯繫的機構。中心之成立，是為了使教區能接觸到國內不斷轉變的情況，并作出適當的回應，也為了推動香港教友聯同普世教會一起，負起關心中國教會的責任。

自從九年前成立以來，我們的中心忙於資料剪存、研究出版、及推進與國內天主教人士的積極交談。

中心訂購百多份報章雜誌，以中英文為主，使我們的剪存資料能追上時代。我們也出版《鼎》雙月刊，引發國外人士對中國基督教的興趣，促進與國內宗教人士的交談。我們亦出版《主愛中華》月刊，附於教區的中文公教報內，使香港教友增強對中國天主教的認識和關心。此外，我們的職員及研究員多次探訪大陸，以推進交流。

我們的中心負責接待來港訪問的中國教會團體，亦應訪問中國的旅客之邀，提供行前講座。隨著旅遊人士數目之增長，這類講座日漸增多，平均每週兩次。

中心也給國內新開辦的男女修院提供一些書本及教育工具；這些支援是中心為培育國內未來司鐸及修女所作的一點小貢獻。

一九七九年當胡樞機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告知我有關教區有意成立中心之事時，他

同時指出中心要盡量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既堅持教區及普世教會所釐定的原則，亦開放予秉持任何立場的人士，與他們展開交談，謀求合一共融。

回顧過去九年，我們從中國所領受的，遠較我們所給付出的為多。我們仍不斷提醒自己，要秉持相互信任、彼此學習和謙卑服務的態度，去履行自己的橋樑角色。

究竟我們能從國內天主教徒身上學到什麼？

隨著歲月的流轉，我越來越相信，初期教會的使徒團體是今日教會的典範，而作為使徒團體的成員，必須具備下列三點要素。

第一個要素就是希臘文的 DIDACHE，意指「生命之道」，即耶穌基督的靈修道路。第二個要素是希臘文的 KOINONIA，意指「共融」，它要求基督徒團體不但在組織上合乎聖統，而且共同建基在信、望、愛上，彼此分享，互相支持。第三個要素則是希臘文的 DIAKONIA，意即「服務」。我發現中國教會有很多動人的事跡，充份反映出初期教會所具備的這三項要素，為我們今日的基督徒團體產生照明作用。

我們聽過一些天主教領袖訴說自己的心靈歷程。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是在壓力下接受了某項職務，因而得不到別的天主教徒的諒解，甚至遭受迴避的對待，以致在他們心靈上造成很大的重壓，至今不消。但他們總不抱怨，從未放棄祈禱，仍努力工作，渴望與普世教會修好。今天，在目前政府對宗教較大的容忍下，他們享有較大的自由，能為教會做一點事，而他們實際上亦把握機會，全心為天主、為教會努力。我以為這樣的心靈歷程，正是設法學習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第二章六至八節所講的基督自空的歷程

：「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這豈不就是「生命之道」的動人例子嗎？它使我更深體悟以下這段經文的價值：「主，請賜我勇氣，去改變可以改變的；賜我忍耐，去接受不可改變的；更賜我智慧，去分辨不同的情況。」

在中國有不少教區，是由德高望重的神職人員所領導，他們做人既有原則，忠於信仰，又能靈活處世，在困難環境繼續努力工作，深受教內外人士的愛戴。在目前較大宗教容忍情況下，他們獲准重返自己的教區，面對梵二前的教會情況。他們中還有些試圖追上現代化的禮儀革新。雖然禮儀還是被規定用拉丁文舉行，但很多時在禮儀進行期間，教友領袖會用中文領導教友高聲誦念或對答，所達致的效果與外間教會並無重大差別。同時由於教友領袖及團體精神的浮現，教會變得更成熟。這豈不充份反映出早期教會共同擘餅及在逆境中一起崇拜的合一精神嗎？這豈不就是「共融」的動人例子？

數年前，國內一個很大的教區，獲政府正式批准，興辦了一所以眼科為主的診所，連醫生、護士及化驗師在內十多位服務人士；床位不多，設備簡陋。開辦一年後，卻醫治了七千病人。他們收到了很多病癒者及其家屬寄來的感恩信、牌匾、謝旗等，也得到當地政府的公開表揚，讚美這座診所收費廉，應診時間不分晝夜，盡最大努力解除病患者的痛苦，甚至送藥到病人家中。結果，當地不久便流行著這句話：「有天主教徒，就沒有辦不到的事。」這豈不就是基督徒「服務」的有力見証嗎？

上述例子，足以彰顯聖神在中國教會的動力；這實是一種經歷數十年困苦後所浮現出來的活力。中國教會足以與初期教會媲美，也教給我們生活在更自由環境下的基督徒團體寶貴的一課。

這些例子亦反映出梵二「教會憲章」緒言所說：「教會在基督內，好像一件聖事，就是說教會是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

在中國，我們可以找到不少像楊國媛女士那樣傑出及令人敬佩的天主教徒。她曾是廣州市的聖母軍團員；我熟識她，是因為我們曾在五十年代早期同屬一個堂區。她真是一位充滿愛心的基督徒；在監獄中，大家都欠缺足夠的食物時，她還故意讓別人多吃，偶然得到一些豆子，還想到分給別人。她的愛心不但感動其他囚徒，甚至令看管監獄的共產黨員為之側目，敬佩不已。她在監獄的英勇見証，豈會遜於富高神父在非洲撒哈拉沙漠 TUAREG 土人中的見証。這樣的現代使徒是透過靜默的臨在和愛的見証，去導引全人類邁向永恆的天主。

究竟我們能為中國教會做甚麼？

多次，當我們問及國內的天主教徒這個問題時，他們回答說，目前情況確比以往改善，但仍希望外間教會人士所作所為，不會引致國內政府加給他們壓力。他們指出目前最需要的是祈禱；他們堅信祈禱的力量。

除了祈禱外，可作的事很多，諸如社會服務、文化交流、資訊互通、神哲學和禮儀等參攷資料的提供、信仰培育的協助……等等，都能有助他們邁向真正的本地化。但最重要最難達致的卻是「修好」或「復和」的工作。無可否認，中國教會是一個受過創傷的教會，互相傾軋和流言蜚語此起彼伏；要

予以重整和治療這種受創關係，殊非易事。若沒有基督徒作中間人，甘願背負彼此間的重擔，是不可能成就的。

當甲和乙不睦時，解決的方法有三個：其中一方認錯，請求對方原諒；或被開罪的一方完全不計較過往；又或者是局外的第三者介入，代替其中一方承擔過失。這第三種慷慨承擔精神，有時確能感動不睦的雙方，達致最後和解。其實，這就是基督的道路；祂雖然無罪，卻為我們罪人承擔了罪過，使我們能與天主重修舊好。

綜合起來，對香港教區過去十年的橋樑工作，可以採用三個字去形容我們的感受：欣喜、困難和可能。

欣喜，因為當我們在一九八零年展開這種工作時，從未意料到我們能夠建立如此多接觸，學習到這麼多東西，結交那麼多朋友，以及把我們的服務擴展得那麼快。

困難，因為在以往九年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很多新挑戰，也必須審慎而明智地處理這些挑戰。

可能，因為遵循著梵二的原則和路線，以及在聖神的指引下，我們深信，主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祈求的合一，必會實現。我們的這份信念，與另一位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內的教會領袖的信念，正好互相呼應。他曾肯定地說：「無論遇到什麼衝擊，我們天主教徒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我們對歷史的主宰應常懷信心，因祂曾許下打發聖神到世界上來；我們亦該當深信，基督的愛可以感化任何人。」

我們衷心祈望天主賜給香港教友勇氣，接受時代的挑戰，致力成為上主手中的謙卑工具，促進教會和全人類的合一。

寫於一九八九年二月